

基辛格的理想主义政治观

雷小华*

基辛格是国际外交舞台上拨弄风云的高手,又是西方国际关系学派中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头号外交家,他推崇的“均势”外交给他带来了赫赫声名,并左右着那个时代美国的外交走向。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成分。主要表现为:否定道义外交,强调利益目标,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强调用力量均衡来维护美国安全,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但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思想所反映出的现实主义政治观是不“纯”的,它夹杂着理想主义的成分。其理想主义政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基辛格的均势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色彩。同遏制战略相比,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均势战略在目标上没有发生质变,仍然是以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为核心,只是在手法、目标的轻重缓急上较以前有所调整。他并没放弃促使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演变的根本目标并为之出谋划策。在其撰写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第七章的标题就是“政治演变:西方、共产主义和新兴国家”。在这一章中,基辛格论述的中心议题就是评述西方政治演变的各种思想并阐述自己对政治演变过程的思考。他提出:“演变的过程取决于三个因素:它的起点、鼓舞参加者的信念(表现为选择的标准)以及环境的压力。”^①冷战结束后,基辛格主张美国可仿照凝聚道德共识的梅特涅的均势体系建立起一个凝聚全球民主共识的均势体系,这就意味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人自命不凡的民主价值观,从而使其均势战略目标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他宣称:“本世纪以来第三次,美国宣布有意建立世界新秩序,把

美国的价值推广到全世界。”^②他在与日本政治家池田大作会谈时曾强调:“我当然是以一个美国人的思想方法在讲话。”^③基辛格还表示:“我们依然能够在使新兴国家认识方向方面做出贡献,并帮助它们形成一种政治体制,使独立有意义和我们的自由及人类尊严的信念有内容。”^④

二是基辛格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也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基辛格将苏联、中国视为拿破仑法国和希特勒德国一样的“集权政体”国家,指责“共产集团”旨在破坏“正统”、“推翻均势”,“不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减弱的程度怎样,它多少仍要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⑤他将20世纪50年代视为类似于拿破仑时期的革命时代,将苏联、中国视为像拿破仑法国一样的革命国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共产集团”明确排斥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谐共处,“共产集团”注定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在他看来,“共产集团”正以察觉不到的方式破坏均势,并利用新独立国家所抱的不满,决心阻止一种平衡状态的建立。在基辛格看来,苏联对美国、西方的挑战和威胁既是地缘政治上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基辛格认为:“安全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安全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社会价值。”“政策设计的目的是

*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事务发展研究所。

① 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第365页。

②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746页。

③ 《和平·人生与哲学——池田大作与基辛格对话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6页。

④ 同注①,第12页。

⑤ 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22页。

解释我们的政策怎样服务于美国人民的目标,那些原则——自由、个人的尊严和法律的威严是我们政策的核心。”

三是基辛格均势战略目标的结盟手段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思想中,既包括明确的战略目标,也包含目标实现的手段。在基辛格看来,结盟是实现均势的重要手段。在设计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手段中,联盟手段占据重要地位。基辛格还探讨了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结盟,如以道义号召凝聚共识的梅特涅式结盟、不以正式条约束缚自己的英国式结盟、“借着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均势”的俾斯麦同盟体系、“政治目的与军事理论完全脱节”不堪一击的法国式结盟,以及他关注最多的将结盟等同为集体安全的美国式结盟等。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提出了两条判断联盟有效性的标准,后在《美国外交政策(论文三篇)》一书中发展成四条标准:1、共同的目的;2、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政策;3、决定共同行动时进行合作的某些技术手段;4、对于不合作的制裁。^①基辛格根据这四条标准来衡量美国战后的联盟体系,发现美国与西欧国家历史上相近、文化相似,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目的。因此,基辛格一再强调:“各国之所以合作,不是因为它们有那样做的法律义务,而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目的。”^②“大西洋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同盟一直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外政策的任何一方面都比不上同西欧的关系需要更多的关注”。^③

四是基辛格认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国际合法性和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而力量均衡最好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基辛格早在1957年出版的《重建的世界》一书中就提出了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模型,在以后的著作中,特别是在《大外交》一书中完善了这一理论模型。基辛格认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国际合法性和力量均衡的基础上。虽然“合法性”不能和“正义”混淆,合法性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享有共同的价值观,但它是适应当时历史时代的,为国家间提供了

道德一致的基础。基辛格说:“正是合法原则在相冲突的主张间确立了相对的正义以及它们的调整方式。”^④

在对均势的分析中,基辛格认为,维也纳体系是近乎完美的均势体系。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支持之下,均衡将会发挥最大作用,均势阻止推翻国际秩序的能力;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协议将阻止推翻国际秩序的欲望。”^⑤“因此,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⑥“美国要以道德共识去支撑均势,乃是合理的做法。美国必须尽其心力,在全球坚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识。”^⑦“美国在走上现代世界第三度来建构世界秩序的道路时,理想主义依然与往常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⑧

他认为:“维也纳会议缔造的世纪和平有三大密不可分支柱:与法国的和解、均势和共同的合法性观念。”但是,维也纳体系能够持久的更重要原因还在于合法性的方面。基辛格写道:“似乎矛盾的是,这个比以前的任何国际秩序都更明确地建立在均势的名义上的体系却很少依靠权力维持。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均衡设计得如此之好以至于聚集起推翻它的力量非常难以企及。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陆国家被共同的价值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有一个物质上的均衡,还有一个道德均衡。权力与正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谐的。”^⑨在此,基辛格认

① 亨利·基辛格:《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47页。

② 同上,第56—58页。

③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 p. 101.

④ 亨利·基辛格:《重建的世界:卡瑟累、梅特涅以及和平的恢复,1812—1822》,波士顿霍顿—米扶林公司,1957年出版,第145页。

⑤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7页。

⑥ 同上,第145页。

⑦ 同上,第773页。

⑧ 同上,第775页。

⑨ 同上,第60页。

为在物质均势之外,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道德、心理均势,这一道德、心理均势与他在此所谓的道德均衡具有相近似的含义。他说:“与物质均衡相并列,存在一个基于价值与信仰等无形事物之上的心理均衡。物质均衡的先决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理均衡的先决条件还有待发现。”^①

五是基辛格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主张建立持久的和平结构,实现永久和平。基辛格童年时期的悲惨命运和早期的经历,强烈地影响着其对生存的感受,他对战争有着梦魇般的恐惧和厌恶,对和平有着强烈的渴望。

由于早年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基辛格相信康德哲学中的“非社会的目的性”意味着各凭自由意志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民族国家在相互竞争中,最终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②。但是,在基辛格看来,“永久和平”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由国家联合体”的基础上,因此在基辛格的目标追求中,实现永久和平与促进自由、民主、人权、正义是紧密联系的,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他说,“我们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必须有比稳定更为深刻的目的”,“我们视稳定为通向人类愿望实现的桥梁而非目的本身,……我们也许改善了对均势的掌握,但我们还没有达到正义的目的”。

核武器的威力和核战争的灾难,使他认识到“在一个战略核均衡的时代——双方拥有毁灭人类手段的时代,和平具有道义上的绝对必要性”。^③他说:“一场核大战将使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所以维持和平是核时代一切政治家不言而喻的长期任务。”

基辛格在其20世纪50—70年代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要建立持久和平的国际结构。他说:“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加强世界和平,美国人民期望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做;核时代则逼使人们把它作为一种道义的和实际的需要。”^④“不管我们的批评者对我们采取的手段有何异议,但作为美国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安宁。”^⑤

总之,基辛格的均势战略思想夹杂着一些理想主义的观点,他很难被视为一个“纯”的现实主义者。他像其他学者和策士一样,其一切政治和学术活动的宗旨都是为了维护和挽救美国优势,实现美国霸权,促进美国利益。他所受的西方教育及其美国文化背景,使他认为西方的伦理和价值观明显优于非西方。他一方面批评美国的理想主义,一方面又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来源于美国的实力和价值观。他在反思越南战争时说:“的确,没有其他社会对其最终的团结凝聚力,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信心,因此它不惜裂解开来审视,确信必能吻合复原。”^⑥

当然,基辛格均势战略思想中的一些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观点并非截然对立,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基辛格提出的均势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而美国国家利益本身包含着意识形态和道义目标,反共意识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不矛盾。因为,遏制共产主义影响的扩大,实际上就是减少和消除苏联或其他潜在对手对美国的威胁。应该说“纯”的现实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都是现实主义政治观和理想主义政治观相结合的产物,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导人有不同的强调而已。直到今天,美国外交决策者都必须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⑦

^① Henry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4, p. 85.

^② “试析基辛格均势战略的目标”,《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39页。

^③ 同注①,第207页。

^④ 《动乱年代》(中译本),第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66页。

^⑤ 同注②,第166页。

^⑥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647页。